

社会转型与教育公平

| 财政约束视角下的人才培养与资源配置 |

Education equity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under financial constraints perspective

—— 马志远 · 金 瑞 著 ——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社会转型与教育公平

| 财政约束视角下的人才培养与资源配置 |

Education equity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under financial constraints perspective

—— 马志远 金 瑞 著 ——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镇 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与教育公平:财政约束视角下的人才培养与资源配置 / 马志远, 金瑞著.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684-0443-3

I. ①社… II. ①马… ②金… III. ①教育工作—中国—文集 IV. ①G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5045 号

社会转型与教育公平

Shehui Zhuanxing Yu Jiaoyu Gongping

——财政约束视角下的人才培养与资源配置

Caizheng Yueshu Shijiao Xia De Rencai Peiyang Yu Ziyuan Peizhi

著 者/马志远 金 瑞

责任编辑/李经晶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212003)

电 话/0511-84446464(传真)

网 址/http://press. ujs. edu. cn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15

字 数/30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84-0443-3

定 价/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如果从学理上给“教育”下一个定义,使其能够全面性地概括教育所有的内涵和过程,将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困难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关系到人内在的精神成长和肉体发育,同时这一成长过程还会不断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二是外部社会构造的变化通过个人成长的环境,对人内心精神的成长和发育不断产生影响。上述过程中,影响个人成长的内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异常复杂,对其中任何一个过程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发生变化,都会导致出现不同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应该是涉及一个人从生到死整个生命周期的所有过程、内容及影响因素的活动。我们通常所说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致上反映了教育过程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也正是由于教育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导致教育学研究比社会科学体系中任何一个学科更具有多面性。换句话说,教育作为一门研究人的成长和发育的学问,需要借助于其他学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才能有效成立。

考虑到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学研究的复杂性,任何试图在一本书籍中对教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进行完整描述的做法都是妄想。那么,在当前社会背景下,什么样的教育问题才是影响我国教育的最具有价值的典型性问题呢?经过慎重的考虑,我们决定以中国社会转型与教育公平的关系为切入点,来研究和分析我国教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重大问题。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构造性变动,市场机制取代了计划体制,产生了持续而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大幅度提升了国民的平均生活水准,同时也带来了地区性经济发展的差异,并造成家庭收入差距的加大。生活水平切切实实地提高了,可民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并没有呈现出与生活水准同等的提高。二是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国民精神的高扬,社会普遍陷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泥坑,国民素养的缺失和人文精

神的陷落,正在腐蚀着社会的肌体,状况变得越来越让人担忧。在上述宏观背景下,教育原本应该起到促进国民精神成长和调节社会紧张的作用,但现实状况却是,教育体制正在成为强化社会构造的工具和手段。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社会构造变动过程中教育的调节功能弱化甚至丧失?教育功能弱化和丧失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毫无疑问,认清这些问题需要分析我国教育体制变革的过程及不同时期教育政策在社会构造变动过程中的作用。

抛开历史演变过程便无法理解当今的社会现实,教育问题也是同样。在此,让我们简单回顾我国教育体制的发展历程。我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建立及变革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间段: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旧制教育;二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形成的现代教育体系雏形;三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教育体制改革。无论是旧制教育还是现代教育,从教育体系的整体上看,其制度化的核心部分是高等教育。旧制教育中,高等教育的形成起源于鸦片战争之后的国外教会势力和清朝政府,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天津的北洋大学及北京的京师大学堂为典型代表。旧制教育的特点是高等教育并没有与中等以下教育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国办大学与民办大学共存,中等以下教育多以民间私塾的形式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2年中央政府将收归国有的大学重新进行拆分和组合,并仿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构建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其最大特征是文理专业分科设校,大学大大缩减人文社会科学类专业,将之集中并形成国家控制的专门研究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同时,高等教育与中等以下教育形成了制度性匹配,设立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将两者相连;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之后,为适应经济发展的市场化需求,高等教育出口处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实施了市场化改革,但保留了大学组织计划经济时代实行的行政事业单位性质,大学入口处的招生仍旧维持了新中国成立后沿用的统一招生制度(部分省市可以采用自由命题),为保证一定的公平性,各省在招生数量上以人口为基数实行配额制。随着大学组织的上述功能性改革,大学组织内部恢复了科学研究活动的功能,教师不再仅仅是教育者,同时还是研究者。

二

如果从哲学上(即思想认识上)来评价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历程,那么,不管是旧制教育体系还是现代教育体系,抑或是改革开放后的教育改革,均是以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为主导的思维意识来构建的。这一点可以从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的“师夷之长,技以治夷”、改革开放之前“教育为革命和经济建设服务”、改革开放之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论述中得到佐证。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维模式主导下的教育制度建设,可能在时代变革的初期和之后的急速发展期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但当社会发展过渡到相对成熟和稳定期时,教育体

系的制度化功能会与社会多样化需求出现背离或冲突,即简单的功能化教育制度设计无法满足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此时,如果不对教育体系进行大胆的制度化改革,将会不断加深制度惯性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回顾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教育体制的发展变革,可以说,我国教育体制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变革,但新中国成立时构建起的功能性制度模式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教育体制体现出的制度惯性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储蓄、发酵,各种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认真面对和慎重思考的地步。我们是继续维持和强化建立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思维基础上的现行教育体制,还是认真反思,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呢?时代发展需要我们做出新的决断。

正如之前论述的那样,教育体系与社会发展间出现的内在和外部的对立与冲突,不可能在本书中进行全面的论述,但我们还是需要一个揭示当前我国教育体制存在宏观性构造问题的切入口,以此为主线剖析我国教育体制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鉴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将问题分析的焦点集中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教育公平问题上,希望借助于教育公平性问题的分析,解读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的宏观结构性问题和微观个人行为方面的问题,同时,通过公共资源配置的分析,测算当前教育体制下各种政策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并以此为基础反思我国近些年来出台的主要教育政策的问题。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逐渐形成的教育体制在中国特有的国家构造中不断被强化成国家体制的功能构成部分,这一特质至今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当国家采取实用性和功利性发展政策时,在现有国家政治模式和管理体制下,教育组织的组织形态和内部管理模式必然会被上述国家发展思维所约束,实用性和功利性的思维模式将会主导教育发展的方向。二是上述功利性思维模式主导下的教育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会造成两个方面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其一,基于集权统治模式下的经济结构,在创造和维持经济发展动力时,会自然派生出体制性放大差异的功能,这种放大功能通过现有教育体制延伸到每个家庭,导致家庭在获取教育机会上的差异不断加大,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公平性问题;其二,经济发展的地区性差异会逐渐演变成家庭经济收入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会通过家庭的日常消费支出活动、社会群体活动、就业等,演变成特定的文化模式,从而形成社会阶层固化的精神和物质基础。一旦出现上述社会现象,社会发展便会表现出各种不健康的症状,如社会阶层间的冲突和对立加剧、人才选拔和流动出现阻滞、经济发展会因为社会矛盾激化出现停滞等。避免和消除上述问题的发生是政府的责任,但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对策才能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和演化呢?大概有两条途径可以考虑:一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避免和消除社会阶层间的不平等现象;二是发挥教育在调节社会阶层移动上的作用。以上两个途径均涉及政府财政资源的分配,而这正是本书为什么选择将教育财政问题作为分析焦点的原因所在。

在中国特有的政体下,财政的力量是巨大的。在现有财税体制下,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造成的地区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差异,本来可以依靠各级政府间的转移支付加以平衡,但前提是搞清楚地区差异的现状和构造。本书依据教育部财政司提供的历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数据,对财政性教育经费差异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公平函数的形式,测算了实现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时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尽管由于统计数据的局限性,这种测算相对粗糙,但还是能够为实现我国教育均等化提供政策上的参考性依据。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现财政性教育经费配置的均等化,仅仅是消除当前教育体制下制度性不公平的举措之一,并非是实现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均等化就等于实现了教育公平。从政府社会治理的角度上来看,从公共财政资源配置的供给侧来消除制度性不公平仅仅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首要条件之一,并不能抵消家庭文化环境对青少年成长所造成的差异性影响。

造成教育公平性问题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过程性因素是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主要表现为不同文化环境对教育结果造成的差异。文化环境差异对教育公平性影响的机制异常复杂,既有历史的原因、自然地理的原因、制度性原因,也有青少年自身内生性的原因。如果单从青少年成长过程的影响因素来推断,家庭文化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家庭文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布迪厄将其归纳为文化资本的传承效应。家庭通过文化符号的传递对青少年的教育成就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家庭文化资本拥有量的多寡及家庭文化符号的传递形式,均会对青少年在制度化学校的教育成就产生重大影响。家庭文化资本的积累取决于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在市场化经济环境下,政府难以对此直接实施干预。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化背景不仅会影响青少年教育成就实现的程度,还会对青少年的精神成长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来看,文化是精神成长的土壤,文化中潜藏的价值基准构成民族的精神,而功能性的应试制度及基于应试制度的学校教育,不但没有起到高扬青少年精神的作用,反而通过强化应试学习的形式不断压制和弱化青少年的精神成长。也就是说,教育制度中的应试教育过度重视单纯的知识传递,弱化了青少年精神的成长,这是功能主义思维模式主导下的教育制度的自然归结。近些年,经济界和知识界对教育体制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该方面。

教育是关系到民族兴旺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发展教育的目的不应该仅仅局限在为经济发展培养合格的人才这一层次上。自改革开放经济政策实施以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国教育的生态环境逐渐被市场化经济的思维所主导,且这种氛围在高等教育扩招之后越显浓郁。出现这种不健康状况,既有家庭

为应对就业市场化需求所致,又有教育体系原本就不该或无法用市场化原理来束缚的政策失误,还有教育体制自身发展的历史性原因,众多原因相互交织在一起,导致出现当今严重的教育病理现象。高等教育就业市场化的需求是家庭参与教育竞争的主要动因,这原本无可非议,问题是这一需求在大一统的教育体制诱导下,会不断膨胀,导致教育竞争的早期化,从根本上扭曲了义务教育本来的制度设计目的,并过早地将少年儿童卷进应试竞争的洪流中。一方面,许多家庭或多或少都意识到少年儿童过早参与竞争并非是好事情,可极少有家庭敢于脱离这种竞争,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被卷进去。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政策还在不断地对教育组织进行着层级强化,从“211工程”到“985工程”,最近又出台了“双一流”工程。不断强化大学组织层级化的政策,向社会和家庭传递了不正确的信号,致使社会和家庭形成一种被扭曲的认知,即位于层级化构造上部的学校或专业就一定是好的,否则就一定是差的。这事实上强化了我国教育体系的阶层构造,助长了家庭参与教育竞争的作用。

四

中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在教育政策上的矛盾,一方面造成大学组织在内部管理上疲于应付和苦不堪言,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完成上级管理部门赋予的任务,因为资源被上级部门控制着,如果不去积极顺应和争取,就无法获得提升办学水平所需要的资源。以高等教育为核心的我国教育体系的上述特质,自新中国成立之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中国教育体系的这种特征被坊间称为“行政化”。可以说,我国教育病理的众多症状无不与此相关。尽管在学术界“去行政化”呼声很高,且持续了多年,但是为什么教育主管部门始终无动于衷呢?恐怕核心的问题是我国教育政策制定上存在着一个极大的误区,即“去行政化”极易被认为是否定或弱化党对教育的领导。关于教育体系中“去行政化”的争议恐怕今后还会持续,问题的根本在于“去行政化”是否就意味着弱化党对教育过程的管理?这不仅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而且也是直接关乎能否为教育体系拆除掉旧有制度约束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寻找出其他替代性的方法来解决教育体系中存在的行政权力过大的问题。比如在制度设计上,通过设置理事会管理各级学校的形式来办学,党的领导可以通过加强对学校理事会管理的方式来实现,这样既可以避免旧有体制遗留下来的弊端,又可通过委托代理的形式实现党对教育组织的管理。

围绕大一统教育体系的管理,我国是通过教育政策进行调整并协调教育体系和社会发展间的关系。这就造成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即以高等教育为核心,其入口处之前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计划经济时代的体制特征,而出口处为了应对经济的市场化需求,采取了市场化管理,两者的匹配存在着逻辑上的矛

盾。高等教育组织在两种体制和价值观中挣扎,一方面要应对大一统的教育政策,另一方面还要针对市场化做出努力。能否将大学办学的自主权真正交给大学,“去行政化”是关键。

五

中国教育体系存在着众多的问题和无奈,这些问题和无奈的根源并非仅仅来自于教育界本身,也不能单纯地归结于社会构造的急剧变动。正如我们对教育所下的定义,教育关乎每个社会成员从生到死的所有过程和内容,与人的成长过程相类似,不同时代变迁的特征总是会给教育体系的形成留下痕迹,这些痕迹既有政治上的,也有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还有文化变异上的。不管是什么原因,教育体系类似于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局部的调整极易忽视整体功能的匹配并造成体系整体的衰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教育体制需要根本性变革,这也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面向未来,我国正处于时代变革的节点时期。改革开放 30 年,经济发展的模式正迎来转换期,维持经济持续发展需要新的发展动力,要从劳动密集型和技术模仿型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这一转变的核心问题是“技术创新”,因此教育被赋予新的期待。期待的内核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技术的研发;二是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新技术的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毋庸置疑,问题是支撑新技术的人才培养机制如果存在问题,技术创新将会是一句空话。解决人才培养模式上存在的问题,需要改革我国大学教育的训练模式,应试教育对青少年创造能力的弱化始终是最大的问题。创造能力是建立在人文素养基础上的综合能力,因而教育的过程绝不能被简单的功能主义思维所控制。

如果本书所提及的观点及分析,能够为我国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的制定起到点滴参考作用,我们将倍感荣幸和自豪。

2017 年 2 月于上海财经大学

目 录

前 言/ I

上篇 社会转型与教育功能

第一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003

第一节 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006

第二节 本书内容的构成与分析框架构建/027

第二章 社会阶层构造与教育异化/034

第一节 社会阶层的不平等构造/034

第二节 能力主义的幻想/037

第三节 作为“选拔装置”的学校/054

第三章 社会变革与高等教育/074

第一节 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进展/074

第二节 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077

第三节 高等教育的育人功能/078

中篇 教育结构与人才培养

第四章 国民教育体系的制度构造/089

第一节 我国学制的历史沿革/090

第二节 我国现行学制体系/093

第五章 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现状/106

第一节 学前教育/106

第二节 义务教育/109

第三节 高中阶段教育/110

第四节 高等教育/114

第五节 职业教育/121

第六节 民办教育/123

- 第六章 教育环境与人才成长/127
- 第一节 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127
- 第二节 青少年成长的环境/130
- 第三节 社会化中的大学组织与校园文化/137

下篇 公共财政资源配置与教育公平

- 第七章 公共财政资源配置公平研究/151
- 第一节 公共资源配置的价值判断与效率问题/152
- 第二节 关于教育公平的制度研究/153
- 第三节 教育公平的含义及其成因/155
- 第四节 教育财政资源配置现状分析/158
- 第五节 教育经费配置差异的原因分析/162

- 第八章 教育财政资源配置测算与调准/169
- 第一节 预算约束条件下的优化教育投入比例/169
- 第二节 教育投入测算中的参数设定/174
- 第三节 以北京为基准测算的教育经费总投入/176
- 第四节 以江苏为基准测算的教育经费总投入/181
- 第五节 教育发展目标与公平责任/183
- 第六节 结语/186

- 第九章 教育公平机制构建与财政投入/188
- 第一节 世界主要国家公共财政教育投入水准/188
- 第二节 我国教育经费负担结构与问题/189
- 第三节 教育的多元化需求与公平问题/190
- 第四节 教育经费投入方案及投入规模测算/191
- 第五节 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194
- 第六节 新型国民教育体系构建的财政政策/204

末篇 教育发展 with 未来展望

- 第十章 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战略选择/209
- 第一节 教育发展战略问题的提起/210
- 第二节 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与模式/210
- 第三节 高等教育政策与规模扩张/212
- 第四节 公共财政投入的结构与水准/214
- 第五节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政策选择/216

第六节 结语/217

第十一章 我国教育的未来/218

第一节 大学选拔方式与教育公平/218

第二节 职业教育分流与免费教育问题/220

第三节 奖学金与助学金制度设计问题/222

第四节 大学办学模式的问题/223

后记/227



上篇

社会转型与教育功能



最近 30 多年以来,教育体制作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的重要因素之一,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政府部门中有关教育政策的制定者及教育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对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教育问题表现出了极大关注。我国教育体制及教育政策应如何适应由于经济快速发展造成的剧烈的社会变化?应制定何种教育政策才能有效消除教育体制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和出现的问题?我国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围绕这些问题,学术界开展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然而,如果试图对这些在各种媒体上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从学术上进行范式化归类,却是一件充满艰难、近乎无法完成的重任。主要困难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我国教育体制的变革是在政治权力强烈推动下的产物,由于“文革”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政治局势动荡,各种思潮对立冲突,指导我国教育体制变革的战略思想并不明晰,因此“文革”结束后教育体制变革的最初动机几乎是本能性地恢复“文革”期间近乎停滞的教育体制的功能。在这一方面,邓小平先生发挥了一个政治家的前瞻性作用。由于我国教育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长期存在的特殊关系,导致我们无法在论述有关教育体制变革的各种问题时抛开政治体制变革的各种背景及其深远影响。但涉及政治问题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畴,而完全不涉及政治体制的变革,又无法说清楚教育体制变革的内在逻辑。因此,本书在涉及教育体制变革的相关内容时,一是对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对教育体制变革的影响保持最低限度的论述。二是基于上述同样的原因,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继承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价值判断,即认可差异化的发生,逐渐取消均等化的教育政策。尽管我国的教育政策在公布的政策文本上大都不这样描述,而是采用了市场化改革的描述,这实际上强化了教育体制构建上的差异化。随着不均衡经济发展政策所造成的地区差异的不断扩大,教育政策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多样化发展的形态。三是公共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在调整地区间教育资源配置差异上的有效作用无法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有关教育法律的规定,各级政府在教育上的职能划分为中央与省级人民政府为高等教育的责任主体,高中以下教育由省级以下人民政府负责。^①由于这种体制上的规定从制度上维护了地区间经济差异导致的教育差异,而中央和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三条。

省级人民政府财政为调节地区间差异而进行的转移支付中,并没有专门列出调节地方教育差异的专项资金统计项目,两者相互叠加导致地区间(主要是县级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上存在的差异无法衡量和显示。四是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必然导致家庭收入的差异,家庭经济条件差异的长期累积,进一步对青少年的成长和教育过程产生潜在的影响,内生性地放大教育制度或教育环境本来就存在的差异,而各级政府并没有在宏观政策和数据上对这种放大效应进行有效评估。五是除成人教育之外的普通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在体制上采用配额制进行匹配,这种匹配存在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与大学自主招生相矛盾,或事实上导致招生生源配置出现偏态分布,处于较高威信序列的大学处于优势地位,加剧上述差异效应。六是由于近些年来国内众多大学组织在内部管理上实施绩效管理,导致教师的教育研究活动处于功利性的状态,所发表论文的数量虽然众多,但模仿性、总结性和比较性的论文居多,真正具有高水准、独创性、思想性的文章极少,难以从学术上对其进行归类,等等。

在此,我们无法将影响教育问题的所有政治、社会、经济、家庭、文化,以及个人行为上的具体原因一一列述,但每一个社会要素的变动或多或少都会对教育体系产生短期或长远的影响,这些影响究竟会产生何种结果难以预测,原因是目前中国社会仍旧处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之中。尽管各级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定者们还在不断地对现有的教育体系进行调整,以期教育体系能够应对社会变化的需求。这些政策调整在某些层面上反映了教育领域研究者的见识,但也仅仅是极少一部分人的意见。大多数国内学者对上述问题,可以从他们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看到相应的论述,但大都是浅显性的论述,实证性的研究积累不足,因而难以从学理上进行系统性和理论性的归纳和梳理。

教育是国家之根本,既关系到每个青少年的成长,又关乎社会构造的再生产,还会从人力资源的形成上对经济产生长远影响,最终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做出贡献。也就是说,教育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反之,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也会影响教育体系的变革。本书不可能将教育体系与社会构造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列入论述的范畴,但有必要选择一个能够反映当代社会变革特征的切入口,并以此为主轴展开讨论,只有这样才能提供一条清楚地理解中国教育体系存在问题的逻辑主线。为此,我们将本书所讨论问题的切入口定在社会构造变动与教育体制改革之间的对应关系上,这些关系的对应方式反映了当前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和矛盾,而导致这些矛盾与问题出现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政府公共资源配置上的政策和变动。我们期望通过之后各章节的探讨和分析,理解产生上述问题的背景及制度性机制,为寻找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提供线索。为实现这一意图,我们姑且大胆地抛开试图对近30多年来教育研究内容的理论性梳理这一想法,从更加宏观的视野,以世界范围内有关社会变动与教育体制变革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作为参照,即在已有成熟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中国国情,

构建分析框架展开分析。为此,本书将从以下几个理论角度分析和讨论以上所设定的问题:(1)功能主义的教育理论;(2)相互作用的社会学理论;(3)人力资本的经济学理论;(4)社会构造与制度理论;(5)方法上的实证主义;(6)文化冲突论。

在以上所罗列的理论范式归类中,功能主义的理论思维和相互作用的社会学理论,主要是从社会构造与教育体系之间的关系上,分析和探讨教育制度的功能性匹配,所涉及的研究范围有:现代社会中的教育体系在青少年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所执行的基本功能,教育体系对社会构造中阶层移动的影响与公平问题,家庭在教育过程中扮演角色的问题,青少年学习成就与家庭文化背景的关系,女性教育问题等。人力资本的经济学理论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将劳动力作为知识和技能的载体,从宏观上对劳动力质量展开研究,分析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同时还在微观上通过接受教育与否的收益率比较,研究和分析家庭对教育的投入行为,从而解释个人接受教育的内生性动机和行为选择。社会构造与制度的理论思维,从现代社会构造中制度的形成与家庭及个人在嵌入社会构造中的行为规律,如教育体系构建与国家发展之间的关系,个人融入社会构造中学校教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个人或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家庭文化、组织文化、社会文化所起到的作用,学校制度与知识论等。方法上的实证主义受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对涉及教育体系与社会、经济、家庭、个人之间的关系,采用实证性方法进行研究。现代统计学的发展为实证性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方法和工具支撑,许多教育学研究者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大量采用社会调查抽样数据的方法开展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证性方法在我国教育研究中开始逐渐普及,并成为研究分析教育现象的有力工具。文化冲突论的理论思维模式继承了自马克思和韦伯以来的社会文化论思维,在此基础上受法国传统的文化——符号论(涂尔干、布迪厄)影响,^①即文化(思想意识与行为范式的群体性表现)在社会构造中的有机关联,从有效连接社会构造的文化及其表象——符号入手,通过分析固有文化的形成和传播对个人、社会阶层价值观产生的影响及制度与文化的对应关系,来分析个人受教育行为与教育制度之间的不平等过程,不同社会阶层在获取制度性教育机会时存在着潜在性的不平等。著名的场域理论是符号论的典型代表。

以上有关教育研究理论视角上的分类,在内容和学科上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划分,归类到某一范畴的理论较之其他范畴的理论也并非存在严格的思想或方法论上清晰的界限。这样划分的主要原因,是便于借助有关世界范围内相对成熟的教育研究理论体系,对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教育研究成果进行有效归

① 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21页。